

CER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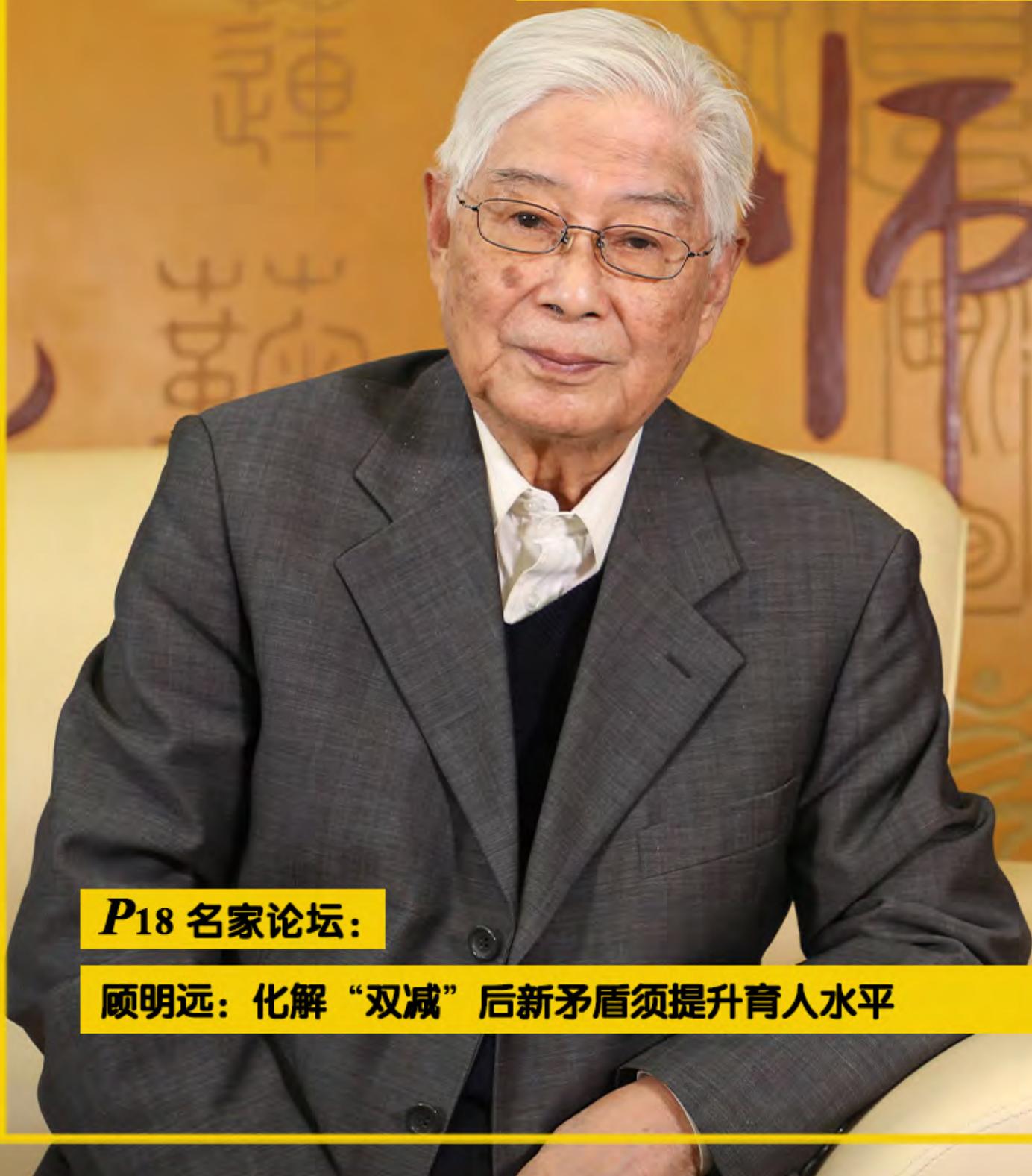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4年03月刊

总第67期



P18 名家论坛：

顾明远：化解“双减”后新矛盾须提升育人水平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01 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中国方案与国际镜鉴

周洪宇

院长视点

07 习近平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向

名家论坛

18 化解“双减”后新矛盾须提升育人水平

顾明远

21 从“双减”试点看我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改革的未来走向

张志勇

专家观点

33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基础、内在逻辑与提升路径

申国昌 白静倩

48 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下的“强师之路”：何以为忧与何以化忧

付卫东

院内动态

59 我院院长周洪宇教授著作获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62 长江教育研究院召开 2023 年年会

66 长江教育研究院发布《2024 年度十大教育关键词》



欢迎与我们互动

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中国方案 与国际镜鉴

来源 | 《世界教育信息》2023 年 11 期



周洪宇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强师必先铸魂。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把握好教师铸魂工作，便把握住强教和强国的基本工作。从系统论角度来看，做好教师铸魂工作应该“扣好第一颗扣子”，即做好教师教育工作，正确认识教师教育是教育

事业的工作母机，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源头活水，才能真正发挥教师教育对于教师铸魂的关键作用。从事教师教育研究工作既要坚持中国立场，以本土化学术自觉扎根中国大地，办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师教育；又要具有全球视野，以全球化思维模式汲取国际经验，办引领世界的高质量教师教育。

党始终高度重视教师教育事业，为教师教育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近年先后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2022—2025）的通知》《关于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表明我国正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此外，党也为教师教育事业提供提纲挈领的原则指导和根本遵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教师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四有”好老师到“大先生”，到“经师”与“人师”的统一，再到2023年教师节前夕提出的教育家精神，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的论述不断深入，标志着党对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化。教育家精神是我国教育家及广大优秀教师在长期的理论或实践探索中所形成的精神共相，彰显了教育家及优秀教师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专业素养和崇高情怀，是广大教师普遍认同并践行的价值理念，对广大教师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价值。具体而言，教育家精神的内在特质可以概括为三个“大”，即“大情怀”“大智慧”和“大作为”。“大情怀”主要体现为家国情怀和教育情怀，“大智慧”主要体现为教师的育人智慧，“大作为”主要体现为勤学善思、躬耕实践和求是创新。三个“大”是教育家精神的内核，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重要部署，还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教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资源，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保障，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打造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纵观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来不平凡的历程，我国教师教育伴随新中国前进的脚步，砥砺前行，锐意进取，书写了中国教育创新发展的壮丽篇章。一是支撑起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教师教育伴随中国教育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辉煌的道路，有力支撑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中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二是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20 世纪 90 年代，独立封闭的师范教育体系被打破，开启了从“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的话语转型，我国“教师教育”开始从独立封闭走向多元开放，逐步融入教师专业化的世界潮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办学层次上看，经历了中师、高等师范专科和师范学院以及师范大学的传统体系，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和师范大学的转型体系，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和师范大学的新体系。从学历层次上看，经历了高中、大专和本科非普及化体系，大专、本科和研究生普及化体系，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大众化体系。从教师发展上看，整合师范生培养为主的师范教育体系和以教师培训为主的职后教育体系，形成了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开放式教师教育体系。从培养主体上看，综合性大学已参与高水平教师培养。例如，南京大学成立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开展教师教育，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也在开展教师教育。师范大学携手综合性大学共同构成了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培养主体。我国师范教育的开放化和师范院校的综合化，实现了对教师教育资源的战略性重组，在这个过程中既适应了国际发展趋势，又发挥了师范院校独特的重要主体作用，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的内涵。三是促进了我国教师教育学科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在学科知识体系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成果推出等方面成绩显著，为教师教育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教师教育学科积极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理论知识，扩展

了教师教育学科的内容和结构，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学科知识体系。教师教育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单位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北京师范大学率先从2002年开始设立教师教育方向的博士点，开始招收和培养教师教育相关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相继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教师教育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招收与培养教师教育相关方向的研究生。同时，出版了一批介绍国外教师教育理论与经验的专著和译著，编撰出版了一批本土化教师教育学专著、教材，发挥了学术成果在我国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中的基础作用。

放眼国际，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变化、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教学变革、人才的全球流动等因素对各国教师队伍建设、教师知识和能力构成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国也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在教师培养、标准建设、专业发展等方面颁布和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教师国际工作组发布的《2022—2025年战略规划》指出，“全球都面临教师短缺，尤其是合格的教师”。英国2021年推出“国际合格教师资格”计划，目的之一是拓宽新教师来源渠道，并在提高教师待遇、减轻教师工作量等方面多举措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英国院校领导者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 Leaders）面向766所公立学校校长开展调研，于2022年8月7日发布调查结果：超九成英国学校整体面临师资短缺问题。调查显示，95%的校长在招聘教师方面遇到困难，43%的校长认为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因教师短缺，31%的学生被合班授课；物理、数学、设计与技术等学科的教师短缺情况更加突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2022年8月发布的有关教师劳动力短缺的报告中指出，学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教师供应和留任挑战”。2022年12月15日，澳大利亚发布《国家教师队伍行动计划》，从改善教师供应渠道、留住现有教师、更好地理解未来教师劳动力需求、提高教师职业地位等方面提出了27项行动，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美

国推动由联邦劳工部负责审批的注册学徒制教师培养项目，以开拓教师培养路径并提升教师职业胜任力。田纳西州相关项目率先通过审批，将注册学徒制作为教师培养模式之一。该州教师注册学徒制项目基于学区的具体师资需求，通过学区和以高校为主的项目供给方的合作，实现在岗学习。高中生、大学生、在职人员等群体都可申请此类项目，在三年内学习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获取学位证书与教师资格证书。

人才培养需求为教师知识能力结构提出新要求。一些国家通过提供资源、培训等方式加强对教师的针对性支持。为维持在全球科创领域的领先地位，2021年，美国提出将量子信息科学（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QIS）整合到高中课程，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组建的机构间工作组负责K - 12量子信息科学框架开发。该框架的计算机科学小组、物理小组、化学小组等工作组具体负责将量子信息科学的关键概念整合到高中计算机科学、物理、数学和化学课程中，为课程开发人员和教师提供支持。[3] 法国要求中小学将媒体和信息教育融入各学科。其促进媒体和信息教育发展的专门公共机构媒体和信息教育中心（CLEMI）于2022年发布涉及所有学科教师的媒体与信息教育（EMI）能力参考框架，明确在媒体文化、社会和公民文化、专业和教学文化等五个维度的三个掌握水平上评估教师相关能力。该机构也帮助教师在国家和学区层面获得支持、资源和培训。

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和教育社会功能的凸显，教师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愈加受到重视，一些国家加强对教师不当言论的规制。在美国，除了大学课堂教学之外，公立学校教师发表职务言论应服从教育管理部门的决定；发表涉及公共政策的评价言论、涉及教育机构或个人违法行为的揭弊言论等非职务言论时，只有当涉及公共关注事务且未损害公共教育管理的政府利益时，教师才有言论自由空间。新西兰2017年颁布的教师专业标准包含教学专业标准和教师职

业责任守则两个部分，其第二部分从职业、学生、家庭、社会四个角度阐明了教师应遵守的规范和应具备的品德。为促进教师对专业标准的理解，新西兰还发布了《职业责任准则实践实例》，以案例形式呈现了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不可接受的、违背期望的行为，有助于教师基于标准规范进行教学实践。

标准的研制实施是教育治理的重要途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各国越来越重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制定科学教师专业标准。美国在出台科学教师专业标准的基础上，还制定了面向不同学段、更有针对性的科学教师专业标准。澳大利亚的科学教师专业标准，也从不同的维度对科学教师行为提出了要求。菲律宾的教师团队专业化和科学教师专业标准制定在发展中国家中领先，于2011年颁布了国家科学教师教育框架，明确了科学教师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与能力。高等教育领域标准的制定也为高校教与学社会适应性和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保障。英国于2023年更新了其适用于各类高等教育教学和学习支持专业人员的国家标准框架。此次修订突出了个性化、包容性、合作性、数字化以及批判性和系统性教学评价的特征，以确保高等教育教与学支持能以多样化方式提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适应性。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扎根中国，面向国际。教师教育是世界各国教育事业发展必然面临的重大议题，建设中国特色、引领国际的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迈向卓越之路不会一马平川。但从总体来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教育发展进入新方位、开启新征程、加速新跨越。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教育战线，遵循教师教育规律，坚持中国立场、全球视野，假以时日，我国教师教育会更加完善、培养质量更加上乘、特色更加鲜明、前景更加光明，将持续为我国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国梦提供有力支撑，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进程中，为世界教育的进步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习近平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的 历史渊源、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向

来源 |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周洪宇

一、引言

教育家有信念、有情怀、有品德，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上是有创新、有特色、有贡献、有影响的优秀人物。教育家精神是我国教育家及广大优秀教师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所形成的精神共相，彰显了教育家及优秀教师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专业素养和崇高情怀，是广大教师普遍认同并践行的价值理念，对广大教师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对“教育家精神”作出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论述。他强调：“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

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教育体系构建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引领新时代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更大成就的思想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实现了历史的锤炼、理论的凝结和经验的跃升，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习近平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的历史渊源

守正创新是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的形成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坚守，是对教师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的历史性认识和把握。

（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道精神的历史智慧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教育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道精神明确规定了教师从教的精神内核，确定了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示范作用，倡导了尊师重道的社会风尚和价值导向。《周礼·地官司徒》云：“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周礼》是最早将“师”与“道”相连的典籍，在“师”与“道”的关联下，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师道观。“师道”分为“为师之道”和“事师之道”。“为师之道”主要就施教者而言，“事师之道”主要就求学者而言。“为师之道”的形成得益于我国历代教育家的积极倡导和实践，蕴含了对师德、师业、师学、师识、师品、师行等诸方面的要求，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师德师风的总括。“人师”是为师之至道，“经师”则次之，是中国历代教师共同信奉和遵循的“为师之道”。“事师之道”主要表现为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道”的优良风尚，教师的地位逐渐上升到了“安邦定国”的高度。正如《荀子·大略》所载：“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为

师之道”和“事师之道”共同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师道，凝结了中华民族世代探索师道的历史智慧，形成了我国教师所特有的职业追求、职业道德和职业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道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道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吐辞为经，举足为法。”“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回信、贺信、署名文章中多次引用上述名言，号召广大教师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道精神，从而明确了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道精神作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源头活水，主张广大教师应尊重、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道精神。

（二）承继建党百年教师队伍建设的历史脉络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教师队伍建设，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教师应传播先进的革命思想，成为弘扬革命精神的中坚力量。1938年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的《边区教师》杂志亲笔题词：“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赋予教师的另一重要使命——教育新人。”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言：“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教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支撑。1952年，教育部刊文明确指出：“人民教师的工作和其

他各项建设工作一样是革命工作。”“人民教师和一切人民教育工作者是新中国儿童青年的灵魂工程师，他们的工作，是一种思想的工作。人民教师是中国工人阶级所藉以实现其对国家领导的极其重要的助手，国家的将来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品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不断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促使教师成为教育改革的主力军。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2010年，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他们投身教育改革创新、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号召教师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成为“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引导广大教师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成为“四有好教师”，成为培根铸魂的“教育家”。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教师队伍建设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连贯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正是对这一历史脉络的接续和发展。

（三）源自夯实教育强国基础工作的历史使命

国家兴衰系于教育，根本在教师。党的十八大以来，教师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教师教育体系基本健全，教师队伍面貌焕然一新，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尽其才、优秀教师和教育家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基本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建设教育强国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弘扬教育家精神，

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时代赋予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

首先，夯实教育强国基础工作要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号召教师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师德师风管理政策，规范和促进师德师风建设，师德师风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其次，夯实教育强国基础工作要求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就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着力完善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制度，通过实施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教学名师、名师名校长、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人才专项，促进教师队伍人才建设取得重要突破。最后，夯实教育强国基础工作要求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战略高度上认识教师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全方位提高广大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真正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下，党和国家建立了以人民教育家、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优秀教师为代表的教师荣誉表彰体系，建立了以时代楷模、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为代表的教师选树宣传体系，促使教师真正成为了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三、习近平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基础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就是要从理论源泉、理论依据、理论根基三个维度出发，深刻理解教育家精神。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理论是理论源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而概括出来的教育基本原理，是教育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都将教师队伍建设视为文明传承、社会进步、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的关键举措，提出了一系列经典的教师教育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教师教育理论，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提供了理论源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关键在教师。第一，教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受雇于资本家的教师，同样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教师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教师是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列宁指出，学校的办学性质和方向是由教师决定的。社会主义办学的性质和方向，只能由教师的政治立场来决定。第三，教师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列宁反复强调，教师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是一支重要的方面军，起着重大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这一改造群众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培养人民自己的教师队伍。第一，造就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突出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应该吸收数十万有用的人才来为共产主义教育服务”。第二，造就一支能够贯彻党的精神的教师队伍。列宁提出：“现在我们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紧密地同党的思想结合起来，完全贯彻党的精神。”第三，使教师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列宁认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根本的是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的素养”。

（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成果是理论依据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

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教师教育领域的集中展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成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提供了理论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的教师教育理论。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发挥教师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教师是干部的干部，是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他希望广大教师献身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做到又红又专。他强调“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教师“要忠诚于党的事业”，教师“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教师要“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中的教师教育理论。邓小平强调，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关键。邓小平反复教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定要尊重教师，造就全党全社会尊重教师的浓厚风气。他指出：“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教师教育理论。江泽民强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教育创新，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离不开教师的辛勤工作。他指出：“我国广大教师，要率先垂范，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弘扬者和推动者，做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努力成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中的教师教育理论。胡锦涛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他认为广大教师应做到“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奋发进取、淡泊名利、志存高远”。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是理论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重要

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的理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教师队伍建设，先后提出了“四有好教师”“大先生”“‘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教育家精神”等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四有好教师”“大先生”“‘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是新时代大国良师的外在标准，“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大国良师的内在要求。修于内而形于外，修于心而笃于行。“教育家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培育新时代大国良师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从“四有”好老师到“大先生”，到“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再到“教育家精神”，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教育的阐释不断深化，标志着党对教师队伍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

“四有好教师”提出了新时代大国良师的“四条标准”，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大先生”提出了新时代大国良师的“三种示范”，即“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提出了新时代大国良师的“两条规定”，即成为“精通专业知识的经师”和“涵养德行的人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述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家精神的“六条要求”。第一条是理想信念，要求教师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彰显了新时代大国良师的政治灵魂，突出了立德树人，旨在落实教育的根本任务。第二条是道德情操，要求教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彰显了新时代大国良师的鲜明品格，突出了“经师”和“人师”的相统一，旨在做新时代“大先生”。第三条是育人智慧，要求教师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彰显了新时代大国良师的本质要求，突出了因材施教的传承与创造性发展，旨在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第四条是躬耕态度，要求教师勤学笃行、求是创新，彰显了新时代大国良师的学识素养，突出了教书育人的品格和作风，旨在成为终身学习的践行者。第五条是仁爱之心，要求教师乐教爱生、甘于奉献，彰显了新时代大国良师的崇高情怀，突出了道德与情感发展，旨在书写教师的教育人生。第六条是弘道追求，要求教师胸怀天下、以文化人，彰显了新时代大国良师的宏大格局，突出了以文化人之弘道，旨在弘扬人类共同价值。

四、习近平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的实践指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从实践指向看问题，就是要弄明白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提出教育家精神重要论述，以及怎样贯彻这一重要论述。

（一）实践指导：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实践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强国建设的精神内核需要以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精神引领和信念支撑，以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最新要求和目标。

教育家精神坚持将师德师风作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师德师风建设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工作，必须以教育家精神作为建设新时代教师队伍的榜样要求和楷模力量。弘扬教育家精神，应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构筑覆盖各级各类学校的师德建设制度体系，认真落实好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弘扬教育家精神，应将教师职业行为准则落实到教师管理具体工作中，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准入、招聘引进、职称评聘、评优奖励、人才项目申报等工作的首要要求，完善师德考核指标体系，提高科学性、实效性，推动师德建设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弘扬教育家精神，应建设国家师德教育基地，发挥好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最美教师”等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弘扬教育家精神，应坚持师德违规行为“零容忍”，完善师德违规处理制度，着重加强对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的监察监督，着力解决师德失范、学术不端等问题。

教育家精神不仅赋予了教师崇高的职业使命，而且赋予了教师崇高的职业光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弘扬教育家精神，应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成果，强化高中和幼儿园

教师工资待遇保障,完善职业院校教师绩效工资保障制度,推进高校薪酬制度改革,落实完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保障教师课后服务工作合理待遇。弘扬教育家精神,应设立“国家教师奖”,推进公共服务对教师优先,鼓励社会力量加强对教师的激励奖励,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支持和吸引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二) 实践要求: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

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是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实践要求。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立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师人才队伍,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大人才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专任教师总数从2012年的1462.9万人增长到2022年的1880.36万人,增幅达28%。各级各类教师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比例超过90%,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从32.6%增长到74.53%,中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超过90%,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超过55%,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比例大幅度增加。这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成为了支撑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大国良师”。

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也是提升教师队伍质量的动力源泉。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要求我国教师教育质量层级向专业化、高端化跃进。严把质量是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弘扬教育家精神,应建立和完善各类教师教育标准,将教师素养目标与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结合起来,统一推进职前教师教育标准建设和在职培训标准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应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包括完善的教师资格和国家统一考试制度、师范生生源质量保障制度、教师教育课程和教学标准制度、师范类专业质量认证和评估制度、教师教育学术学科制度和教师教育专业学科制度,不断夯实教师教育学科资源、制度资源、人力资源。弘扬教育家精神,应设立专门的教师教育质量管理机构,在原有的三级五类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基础上开展更多工作,鼓励第三方评价机构参与

评价工作，开展全国师范类专业质量监测，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以评价促进质量的提升。

（三）实践任务：培养新时代“大先生”

培养新时代“大先生”是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实践任务。“大先生”之大，不在年龄之大，不在学校之大，也不在学段之高，而在于信仰之“高”、修为之“深”、底蕴之“厚”以及育人之“智”。“教育家”和“大先生”在精神内核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弘扬教育家精神就是要培养新时代“教育家”，培养新时代“大先生”。

弘扬教育家精神需要明确“大先生”培养的重点。一是教师要做到“两求”，求真务实，博大开阔；求学创新，前行开拓。二是教师要做到“三爱”，热爱祖国，明确使命；热爱学生，传真善美；热爱教育，毕生追求。三是教师要构筑“两大支柱”，重视理论，强化能力；勤于实践，丰富经验。弘扬教育家精神需要明确“大先生”培养的内容。一是培养教师的专业气质，塑造为人师表形象。二是培养教师的专业情意，提升专业自我认同。三是培养教师的专业知识，优化专业知识结构。四是培养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教师育人水平。五是培养教师的专业风格，提高教师教学魅力。弘扬教育家精神需要明确“大先生”培养的目标。一是让学生做信心满满、阳光开朗的“小先生”，以主人翁的心态去探寻知识、传播知识。二是让教师负起“大先生”担当，既为“小先生”做示范，又为“小先生”做帮手。

五、结语

大力弘扬和培育教育家精神，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需要，是推动教育改革创新、推进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动力源，是落实“强师计划”“优师计划”“国优计划”等战略举措的坚强支柱，是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强大引擎，是中华民族赓续文明、传承文脉的精神追求，是驱动广大教师实现自我精进、自我完善的强大力量。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我们亟需发掘、凝练、弘扬教育家精神，发挥其精神驱动和引领价值，为我国的教育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创机赋能。

顾明远

化解“双减”后新矛盾须提升育人水平

来源 | 《中国教育黄皮书》2023 年版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明远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学生课业负担减轻了，学生高兴了，但老师觉得责任重了，负担也重了。有些家长对减负还不太理解，担忧学生学习成绩会不会下降。“双减”政策推进后，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

如何化解这些矛盾？首先要认识为什么要减负。减负之前，中小学最突出的问题是，学业负担太重。学生整天埋头于作业，睡眠不足，又缺乏锻炼，体力下降，影响身体健康。学生负担太重，不仅影响到身体，而且影响到学生心理健康。学习缺乏兴趣，被动学习，不仅效率不高，而且会形成扭曲的心理，把学习作为竞争的手段，把同学作为竞争的对手，缺乏抗挫折的能力。学生负担太重，没有时间走向大自然、走向社会，不了解世界、不了解社会，缺乏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知识、创新思维和能力，对他们将来的学习和发展都很不利。减负就是为了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负担减轻了，就能真正做到“五育”并举，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从学校课后服务水平、课堂教育教学质量、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等方面，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和教师提出了新要求，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教师的负担。

教师的负担确实加重了，教师不仅要管课堂，还要管课后，要管学生放学后的两个小时。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学校要调整管理方式，帮助教师解决困难，例如实行弹性坐班制；做好家长的工作，让家长理解“双减”的意义，争取家长的配合；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来解决学生课后托管辅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要把课堂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让每个学生在课上都能学懂学会，学生课堂效率提高了，课后就可以减轻作业负担。

这就要求提高教师的育人水平。要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现在学界流行“深度学习”的概念。什么是深度学习？就是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去思考、去掌握知识及知识的本质。古人曰：学而不思则罔，又曰：举一反三。只有让学生主动地、积极地学习才能做到。要改变教师单方面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然后用题海战术、机械的练习来巩固知识的局面。教师在课堂上把学生教会、教懂了，那么课后就可以少布置一些作业。现在大家都在研究怎么布置作业、布置什么样的作业。布置作业也有大学问，作业不在多，而在精，在于能使学生思考，掌握知识的本源，减少机械的练习。作业少了，学生就有时间参加各种活动。

教师要深入研究教材，掌握教材的核心概念及其本质原理。教学不是简单地把现存的知识（公式）教给学生。有一次，我听了一节数学课，老师讲“三角形的面积”，他让学生在黑板上画了正方形、长方形，对角线分开，说明三角形的面积是高乘以底除以二。但一名学生画了一个梭形，这位老师就不知所措了，最后说：“只有等边三角形才能这样。”说明这位老师自己没有掌握三角形面积的原理，也没有把最基本的概念教给学生，只是把公式教给了学生。教学的本质是促进学

生的思维发展。一堂好课就是要通过教材中的知识来启发学生的思维。学生掌握了，就可以减轻课后作业负担，提高学习质量。

教师要深入研究每一个学生。教书育人在细微处，教师不仅要研究教材，还要研究学生。每名学生天赋不同，思维的品质不同。有的学生思维敏捷，但不一定深刻，常常举手好答；有的学生思维缓慢，但思考问题较深，可能不喜欢举手抢答。每名学生都会有各种表现，教师要了解，然后因材施教，使每名学生都能学懂学会，不断成长。《学记》里有一段话：“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段话至今犹有现实意义。

教师要把学习的选择权还给学生。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改变“被教育”“被学习”的现状，让学生主动、积极、有兴趣地学习。因材施教正确的理解是给不同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学校和教师的责任是为每个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学习本来是学生自己的事，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学习选择权还给学生，并不是放任不管，教师有责任加以引导、指导。特别是低年级的儿童，他们还没有能力选择，更需要教师和家长的指导。我们要相信每一个学生，让他自己生动、活泼、自由地发展。要相信孩子，相信他们的能力。我们的教育其实就是在挖掘他们的能力，启发他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给他多少知识，而是我们要帮助他发挥自己的才能。

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减轻了、学习成绩提高了，家长的焦虑就打消了。相应地，教师的负担也会有所减轻。因此，当今学校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课堂教学上。教师要不断钻研反思，提高育人水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才能化解由“双减”而产生的新矛盾。

张志勇

从“双减”试点看我国基础教育 公共服务改革的未来走向

来源 | 《中国教育学刊》2022 年 11 期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 张志勇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作业改革”“课后服务”“规范校外培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强化配套治理”“扎实做好试点探索”等方面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

本研究通过教育部、试点城市政府官方网站以及与当地教育部门沟通咨询，搜集《意见》颁布以来中央和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成都、郑州、长治、威海、南通 9 个试点城市“双减”跟进政策文件共计 156 项（截至 2021 年 1 月）。语料库构建以简化、直接为原则，聚焦政策文本中构成目标的具体任务以及达成任务的主要政策工具。进而，基于政策“经验”的“双减”改革政策文本搭建包含作业负担、课后服务、校外培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均衡发展、高中招生制度改革、家庭

教育 7 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梳理中央及以 9 个试点城市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推进“双减”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和抓手，针对“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的主要落实举措展开分析。

一、政策分析：试点城市“双减”改革的主要举措

（一）全面推进作业改革

《意见》制定了“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的改革目标，并对学校提出了健全作业管理机制、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加强作业完成指导等具体工作要求。试点城市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出台 7 项专项政策，其中包括广州 1 项、成都 1 项、长治 1 项、威海 1 项、南通 3 项。“质量”、“时间”、“难度”、“类型”、“教研”、“培训”、“交流”、“督导”、“制度”、“评估”等成为政策要素高频词汇，反映试点城市将赋能教师作业改革、推动学生作业“质”“量”平衡、健全作业监管机制等作为政策实施的主要着力点。上述 5 个试点城市围绕“减量”“提质”这两项作业改革核心要求，从作业的“时间”“难度”“类型”等多重维度上，对教师的作业设计和布置提出具体要求、进行专门指导，特别重视发挥“教研”“专题培训”“展示交流”等活动对教师作业改革的赋能作用。

（二）全面规范治理校外培训

《意见》要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中央和 9 个试点城市出台跟进政策 70 项，占全部 156 项政策的 45%，可见规范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在“双减”中的重要地位。其中，北京 3 项、上海 11 项、威海 12 项、长治 5 项、郑州 9 项、成都 7 项、广州 3 项、南通 20 项。围绕校外培训治理，各试点城市出台的专项政策以贯彻中央出台的权威性行政措施为主，高频政策关键词如下：“登记”（15 项）、“收费”（18 项）、“广告”（7 项）、“风险”（7 项）、“非学科”监管（14 项）。

1.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营转非”

《意见》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机构”（下文简称“营转非”），“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

逐步大大压减，解决过多过滥问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严重问题的机构”。围绕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治理，《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登记管理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关于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通知》先后出台，对“营转非”的审批、重新“登记”办法、实施流程和保障措施作出具体规定。

2. “预收费”与“资金监管”

《意见》规定“通过第三方托管、风险储备金等方式，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加强对培训领域贷款的监管”，“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部门负责指导银行等机构做好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风险管控工作，清理整顿培训机构融资、上市等行为”。中央层面出台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和《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下文简称《预收费监管通知》）两个专项政策。北京、上海、威海、长治、南通5个试点城市作为首批尝试通过“收费管理”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地区主要措施如下：一是要求培训机构统一使用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二是规范“预收费”的时间和周期；三是强化信息公开；四是预收费用须全部进入机构唯一学费专用账户，由第三方进行监管；五是规范退费和纠纷处理程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3.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管控”

《意见》规定：“做好培训广告管控。”2021年11月，中央层面颁布专项政策《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郑州、成都、南通出台了跟进政策，南通市基于更早的治理经验，由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委宣传部等九部门共同制定了《南通市深化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实施方案》，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联动机制的主体由三部门扩展为九部门，明确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提出了常态化管控要求，是落实力度最大、跟进政策最全面具体的试点城市。

4. 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风险防控 ”

《意见》规定：“ 政法部门要做好相关维护和谐稳定工作；公安部门要依法加强治安管理，联动开展情报信息搜集研判和预警预防，做好相关涉稳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为有效防控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上海、威海、长治、南通 4 个试点城市出台了专项政策文件，威海颁布了 3 项文件，其他试点城市均在综合落实政策文件中要求强化风险防控工作。一是针对培训机构跨区经营问题，上海、威海分别作出“ 注册地优先 ” 和“ 属地管理 ” 的规定；二是建立多部门协同的风险防控机制，由主管部门主动与培训机构负责人沟通；三是建立了风险防控专班。

5. “ 学科 ” 与 “ 非学科 ” 类别鉴定

2021 年 7 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要求以校外培训科目主题为依据，对学科与非学科培训的范围进行界定。北京要求依据中央政策开展学科与非学科鉴定工作；上海（1 项）、威海（2 项）、广州（1 项）、南通（2 项）、成都（1 项）5 市出台专项政策，明确提出由规定数量和特定资质的专家组成专业鉴定组织，以保证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并明确了具体的工作流程和要求。

6. “ 非学科 ” 类培训机构管理

《意见》明确要求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各地要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威海和南通由体育局、文广旅局、科技局分别针对体育类、艺术类和科技类培训颁布了专门政策，成都由科技局联合三部门对科技类培训出台了专项管理政策；北京、郑州、广州、沈阳根据学科内容将机构管理归属相应主管部门；长治所有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由教育局和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统一管理；上海则在“ 双减 ” 综合意见中强调“ 明确相应主管部门 ”，尚未明确具体管理部门。总体看，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治理，各试点城市普遍处于探索阶段。

（三）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优化课堂教学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意见》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列入“双减”工作目标，要求“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以威海市（1项）专项政策和9个试点城市15项综合文件的相关举措为分析对象建立语料库，发现试点城市在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方面聚焦的主要政策要素为“课程”、“教研”、“教师”、“信息技术”等。

1. 深化课程教学改革

课程是学校落实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各试点城市按照《意见》，强调建立健全教学管理规程，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实施教学，并对课时、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难度、命题、成绩呈现等作出规范性要求。部分试点城市针对建立健全课堂教学评价机制提出具体制度性要求。

2. 加强教研指导和示范引领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把“教研”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举措，要求“发挥教研支撑作用”。《意见》出台后，北京、沈阳、长治、南通、威海五个试点城市均把教研作为重要环节，强化对课程、教学的研究和指导。同时，成都、南通、威海、郑州等市关注名师名校、优秀成果的示范引领作用，具体举措主要围绕组织系列活动、培养名师队伍、建设示范区和示范校、案例推广四个方面展开。

3. 强化信息技术赋能，构建高效课堂

《意见》要求“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免费向学生提供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并“组织优秀教师开展免费在线互动交流答疑”。北京、上海、南通、广州等城市在加强在线学习平台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课堂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一是注重因材施教，广州市鼓励学校应用信息技术手段“采集学情分析数据，精准分析学情”；二是加强教学诊断与改进，南通市要求教师“信息技术熟练，教学媒体应用恰当，有效使用大数据资

源”，“实施个性化教学”；三是优化课堂学习方式，上海市主动探索以线上资源赋能线下教学，“加快教室数字化改造”，实现课堂上“即时互动、远程协同、全程辅助和智能评估”，北京市积极推进“空中课堂”“双师课堂”“融合课堂”建设，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

（四）全面推行课后服务

《意见》要求“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2021年7月，教育部出台《关于督促“一校一案”全面落实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指导学校“一校一案”，制订课后服务具体实施方案。北京（1项）、上海（1项）、广州（1项）、成都（2项）、长治（2项）、威海（1项）、南通（6项）共出台14项跟进政策，其中，聚焦的主要政策要素为“资源”、“教师”、“保障”，反映了五个试点城市落实课后服务政策的路径特点。

1. 充分整合资源，拓展课后服务渠道

《意见》提出“拓展课后服务渠道”。各试点城市注重通过整合学校、学区、社区教育资源，以及引进校外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优质资源，加大课后服务资源供给。威海、南通分别出台专项政策，对校外资源的引进、保障，以及准入和退出条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2. 完善教师权益保障和激励机制建设

《意见》明确“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教师承担”。教师是学校课后服务的实际承担主体，是提升课后服务供给成效的关键。各试点城市围绕教师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机制进行制度设计，旨在提高教师参与、做好课后服务的内驱力。

在权益保障方面，6个试点城市聚焦教师休息权和薪酬待遇两个着力点。上海、广州、成都、长治等市提出教师“弹性上下班”“弹性休假”“调休”等制度，保障教职工学习、备课时间和休息权益。同时，要求对参加课后服务的教师按照相关规定给予相应补助，保障教师薪酬待遇。在激励机制建设方面，各试点城市关注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和绩效工资三个要素，要求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

作为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和绩效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但是，目前大部分试点市并未明确教师课后服务补助标准。进一步完善教师评价与激励实施细则，已成为推动教师权益保障的重要政策方向。

3. 重视保障体系的系统性建构

明晰各部门、各单位课后服务职责。《意见》出台后，广州、成都、长治、威海、南通5市教育局均独立发文5项，其他试点城市由教育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合发文，涉及财政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税务局四部门，形成了教育部门在课后服务指导和保障机制建设上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参与治理的新机制。

加强课后服务收费监管与经费保障。“双减”试点城市坚持非营利原则，保证课后服务的公益性与普惠性，积极探索适合当地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其中，上海、郑州采取政府财政全额保障办法，明确相关经费按学校隶属关系，由县（市、区）财政分别承担；成都、南通等市遵循“家长自愿、成本补偿、非营利性”原则，实行“成本分担”机制，以课时、月、学期等计量单位核定和收取课后服务性费用。

加强课后服务监督评估。监督对象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学校、教师、参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等；监督内容包括政府教育履职情况，学校课后服务安全管理情况以及服务质量、范围、内容、费用收取等情况，也包括教师有偿补课、集体教学、义务教育群众满意度等情况；监督形式包括专项督查、集体视导、常规检查、阶段性调研和综合评估等；监督主体包括教育督导等政府部门、专业调研机构、家长等。

加强课后服务宣传。通过多种方式，面向区域、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等利益群体广泛解读课后服务的目的、意义、方法、措施，以及课后服务成效和优秀经验，努力凝聚社会最大共识。

（五）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意见》规定：“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地要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成果，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充分激发办学活力，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差距。”2021年9月和12月，中央层面分别出台了《关于编制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的通知》。这些文件聚焦的主要政策要素为“办学”、“教师”、“资金”和“财政”，反映中央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一是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合理确定城镇办学规模，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二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深化“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科学有序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建立健全教师培训和教研制度；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确定年度项目和资金安排，不留资金缺口。

以北京、威海出台的4项政策和《上海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相关政策组建语料库，“教师”、“质量”、“教学”、“办学”、“校长”、“保障”成为政策要素高频词汇，说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提高校长治校办学水平等是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最主要的政策实施手段。在加强校长队伍建设方面，北京是改革力度最大的试点城市，全面实施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实行校长任期目标管理制度，完善中小学校长绩效工资制度，健全中小学校长职级制度，完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机制，将农村校、薄弱校任教经历作为聘任校长的硬指标，加强校长队伍专业化建设，构建校长专业化培训体系，实施“名校长工程”等。

（六）深化高中招生改革

2021年3月，在《意见》颁布前，上海率先出台《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要求“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意见》颁布后，北京出台了《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上海出台了《关于公布2022年上海市普通高中语文、数学和外语3门科目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命题要求的通知》。北京、上海考试招生改革的探索，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样板。

一、未来走向：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构与再造

（一）建立全域优质义务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长期以来，受重点学校制度和应试教育影响，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过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极度稀缺导致教育的“内卷效应”日趋严重。全面缩小区域（县、市、区）内校际教育差距，办好家门口的每所学校，让广大人民群众从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内卷效应”中退场，是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治本之策。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意见》确立了“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战略目标，推出了“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以及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改善办学条件、加强优秀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等重要举措。但是，义务教育优质资源的“局部增量”解决策略，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身边好学校的普遍需求，优质资源的供给必须从“局部增量”解决方案，转向“全域优质”解决方案，建立全域优质义务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从“做蛋糕”和“分蛋糕”两个方面着力构建义务教育公平的新格局。“做蛋糕”，就是实施教育底部提升战略，推行义务教育学校公共服务均等化清单，全面提升底部学校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使之尽快成为人民群众身边的“好学校”；“分蛋糕”就是通过交流轮岗和集团化、学区化、一体化办学，以及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均衡配置到域内普通初中等优质资源公平配置新机制，促进优秀校长、优秀教师、优质高中入学机会资源共享，吸引优秀学生更多地留在身边的学校读书。

（二）重构学校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意见》明确指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要求“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双减”改革的这些政策指向，确立了学校教育在学生学业质量达成中的主体地位，要求统筹“课堂教学”“作业改革”和“课后服务”，建立学校教育公共服务新体系。

延长校内学习时间，增强课后服务，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

品质的共同做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治本之策。让学生在校园内学足学好，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统筹“课堂教学”“作业改革”和“课后服务”改革。一是要统筹课堂教学和作业改革。把作业改革融入课堂教学改革之中，依据课程标准、学业质量标准和学生学情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强化技术赋能作业改革，实现学生学情诊断、个性化作业布置、作业改革智能化；提高教师作业设计专业能力，健全作业质量评价体系。二是统筹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都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课堂教学立足于所有学生的共同成长，课后服务立足于每个学生的差别化教育。

恢复课后服务，将“三点半”“四点半”教育重新回归学校教育，是我国学校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构。这个重构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推向市场的课后教育重新“拉回”学校教育体系，恢复其公共教育属性，必须建立以财政为主、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担、政府与家庭合理分担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建立教师课后服务补贴制度；二是建立差别化、个性化、实践化的“课后服务”教育体系，形成“统一化课堂教学”和“差别化课后服务”相统一的学校教育新体系，这是我国学校教育体系的重大变革。

（三）建立校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意见》明确指出：“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双减”政策及中央和试点城市的跟进政策主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深化改革，实施校内外教育协同治理，对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的关系从以下三个方面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一是调整教育属性，规定校外学科和非学科教育一律坚持公益属性；二是规范教育时间，“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三是划定教育边界，校外教育不能取代学校教育，要求“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同时，积极支持校外非学科实践教育。

根据上述要求，北京、威海、成都等试点城市全面建立校外学科和非学科培训新秩序。以公益性为主导的校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正在沿着“回归、重建、

互补、社区化”的路径向前推进。一是校外培训机构全面从市场化向公益性回归。无论是学科类培训，还是非学科类培训，都要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二是重建校外公共教育体系，教育系统的校外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基地，共青团系统的少年宫，妇联系统的儿童中心，科协系统的科技馆，体育系统的体育馆，文化系统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社区儿童之家，以及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有义务为未成年人提供公益性校外教育服务。三是重建学校教育 with 校外教育互补关系，学科教育回归学校教育主阵地，非学科实践教育回归校外教育主阵地。同时，一些试点城市引进校外教育机构提供课后服务的尝试，正在推动我国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资源供给关系的调整。校外培训机构不能代替学校教育，并不意味着校外教育机构不能进入学校公共教育体系。校外教育机构完全可以向学校教育体系提供高质量的可选择公共教育服务。四是社区将逐步成为校外教育资源供给的重要主体。

（四）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公共服务体系

“双减”通过学校提供课后服务，让学生在校基本完成作业，以及寒暑假、节假日、双休日不允许校外培训机构补课，正在倒逼家庭教育变革，重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一是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意见》要求“教育部门要会同妇联等部门，办好家长学校或网上家庭教育指导平台，推动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服务站点建设，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理性确定孩子成长预期，努力形成减负共识”。二是建设家校协同育人共同体。《意见》要求“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进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责任，密切家校沟通，创新协同方式，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三是分工协作协同育人。《意见》要求“学校和家长要引导学生放学回家后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进行必要的课业学习，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家长要积极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帮助其养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各级政府应切实承担起家庭教育公共服务法定责任，加快建立以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为主导、家庭教育网络平台为载体、家庭教育课程大纲为依据、社区和学校家庭教育服务为两翼的“五位一体”的家庭教育指导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学校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主体地位。

（五）建立基础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

“双减”改革对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7个试点城市作出明确具体部署，特别是普及和推广智慧作业系统，为学习困难学生提供在线公共服务，赋能教师课堂教学改革等，成为各地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路径。但是，教育信息化既需要较强的经费投入保障、教育信息技术人才支撑，更需要良好的教育改革环境的支持。而这一切，处于我国教育发展体系底部的农村和县域学校恰恰处于不利地位，各级政府必须担负起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供给者的角色，以防止城乡教育质量被进一步拉大。

加快建立健全基础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我国保障教育公平、深化“双减”改革、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当务之急。一是健全学校教育信息化硬件环境，包括带宽、终端设备、智慧教室等；二是健全教育信息化软件环境，包括数字存储、平台、资源供给等；三是健全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体系，包括信息技术支持、数据集成、数据开发和使用等；四是健全教育信息化成本的政府、学生家庭和社会合理分担机制，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设立专项经费，支持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建设基础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必须转变传统教育信息化模式，实现教育信息化由市场主导向政府主导转型，由企业技术驱动向教育应用驱动转型，由学校为单位应用向县（市、区）域为单位应用转型。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强化公共教育数据中心建设，建立统一开放的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市场体系，健全国家数据标准和数据应用体系。

作者信息：张志勇，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赵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李婉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申国昌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基础、内在逻辑与提升路径

来源 |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3 年 12 期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江教育研究院秘书长 申国昌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原则。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从曾经的高等教育弱国到如今的高等教育大国，再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制定，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彰显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指引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当下，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这要求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基础和内在逻辑，积极探索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道路自信的路径。

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基础

五千年以来，我国在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树立了深厚的道路自信。这一道路自信来源于古代高等教育的悠久历史传统和对近代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更是厚植于党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百年探索的历史经验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高等教育现代化取得的重大成就。

1.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悠久历史传统及其自信根源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孕育和滋养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根源。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承担着研究、传授当时历史条件下高深文化知识以及培养国家需要的高层次统治人才的双重任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所能接受到的最高层次的终端教育。商代已有大学、小学之分。西周建立了完备的学校制度，对大学的教学内容、考核与奖惩制度、修业年限等作了详细规定。先秦时期，官学式微，私学兴起，官私学互补的高等教育格局得以初步构筑。其中，孔子首创的私学，以自由讲学、自主探究、思想自由为特色，是我国古代私学形式高等教育的先声和样板。齐国开设的稷下学宫，集讲学、著述和育人为一体，是“中国教育史上创办最早、历时最长的实行自由讲学、自主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西汉创立太学，至此，中国古代社会专门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正式创办。隋唐时期，“六学二馆”和各种形式专科学校的创办以及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规范化。“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的科举制度的创立，为世界提供了高等人才选拔的中国方案。萌芽于唐末、兴盛于宋元的书院，形成了以自由讲学、交流研讨、自主学习、民主管理为特征的高等教育模式，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明清时期，国子监与国子学（太学）合为一体，既是最高学府也是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基本形成了古代高等教育兴国的中国模式。

严格地说，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但却是古代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形式。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教育理念和完整的教育体系。孔子创立的私学、西周官学、汉代太学、魏晋国子学、唐宋书院、明清

国子监，构成了一幅鲜活完整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历史图景，使我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同时，随着学校等级的放宽、教育对象的扩大、教育内容的丰富，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也自发缓慢地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可见，自古以来，对高层次统治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对儒家文化的研习与传播，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鲜明的特色，在一定历史时期处于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积聚了丰富宝贵的历史资源，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源泉。

2.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及其自信萌发

西方资本主义的东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道，近代高等教育也在沿袭中寻求突破、在变革中寻求生路，“在‘西学东渐’影响下逐步迈向现代化”。有志之士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中国化探索，寻求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19世纪中后期，洋务派在“中体西用”原则的指导下先后开设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校，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帷幕。维新变法期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维新中诞生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进展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全面启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废除科举制度，推广新学制，以学习与借鉴日本模式的方式推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体系的初步建立。中华民国教育部成立后，颁布“壬子癸丑”学制，颁行《大学令》，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从借鉴日本转向学习欧美。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促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完善，“奠定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学制的基础”。抗战爆发后，为保存我国高等教育实力、保护高等教育不因抗战而中辍，百余所高等院校内迁。这场空前绝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知识精英的战略大转移，为中国教育保存了一批精英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西南、西北等边疆和内陆地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基本路线。清末民初，由于政局跌宕，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治削弱，先进知识分子对参与高等教育公共事务的热情极为高涨，使“自下而上”的路线得以开启，与

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路线并行，推动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先效法日本、后模仿欧美，但并非盲目照抄照搬，而是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在深入思考、凝聚智识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所进行的曲折探索。因此，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西方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和改革经验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深刻影响，更要清醒认识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对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不懈探索的辛勤付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是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现代化曲折发展历史经验的理性认识，更是对全体人民探索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坚强精神和坚定信心的高度肯定。

3.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及其自信增长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选定，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兴党”“强党”的发展历程逐渐孕育、成熟与定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满足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积极探索，经湖南自修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新型大学传承创新形成了“延安模式”这一真正本土化的高等教育模式，“奠定了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特色基础，也为新中国积累了兴办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注入了红色基因。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现代化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学习苏联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理和重建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有序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明确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开启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邓小平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时进一步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此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转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78—1992年，党中央出台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文件指导高等教育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改革，高等教育在专业调整、教学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使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需求相匹配，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夯实了基础。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教育法律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

为全面依法治教奠定了良好基础”。我国于 1995 年开始实施“211 工程”，1999 年正式启动“985 工程”，建设了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迈入新世纪，我国“历史性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在 2008 年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水平获得极大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可以看到，党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延安模式”作为本土化的高等教育模式，满足了革命战争和夺取政权对宣传教育、培养革命干部的需要：“苏联模式”在新中国急需专门人才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使高等教育现代化陷入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我国也由此认识到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后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规范化、体系化、科学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可以说，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正是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对高等教育现代化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与客观选择。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形成与增长，正是基于党领导高等教育现代化事业百年艰苦奋斗的历史经验和巨大成就。

4.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定型及其自信底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战线“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全面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质量、支撑引领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服务质量，加快完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范式”，在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同时加快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上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指示，明确了加快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行动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论断以及“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要求，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成效显著。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接受高等教育的总人数达到 2.4 亿，国民素质不断提升，2022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9.6%，实现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高层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持续增强，形成了布局清晰、层次合理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和办学实力跃居世界中上水平，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突破性贡献，都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找到了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也为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底气。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征程中，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不是延续我国传统高等教育的模板，不是简单照搬西方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翻版，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再版，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不断探索、选择、验证与创新模式后逐渐形成并定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积极探索和突出成就，充分肯定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选择，也增强了我国继续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自信。

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内在逻辑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从对高等教育理论的反思与建构，到对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建制，再到对高等教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我国在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走出了一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厚植了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助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道路自信。

1. 理论为本：以理论自信为基础丰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内涵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论自信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内在

动力。高等教育学及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推动了高等教育理论的进步，也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都存在一连串的问题，有待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道理，而这些问题，往往不是一般的以普遍中小学为研究对象的普通教育学所能解决的”，故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具有深刻意义。建立“高等教育学”成为发展现代高等教育的必然需求和教育学界同仁的普遍共识，以潘懋元为代表的教育学者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与重点问题，高等教育科学与高等教育学体系问题，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与价值问题等若干基本问题作出大量的思考与讨论，先后发表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思想大讨论，学界“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迎接新技术革命，立足国情，面向世界，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致力于构建现代高等教育思想体系。随后，从20世纪90年代“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理论要点”，到世纪之交的“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再到今天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研究”，都是学术界在党的领导下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系统研究，是积极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成果。一方面，既有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揭示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变革提供科学指导和理论支持，保障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方向选择；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理论直面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定位、分析框架、发展模式、实现特征、指标体系等重大问题，并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阐释和客观解答，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树立提供学理支撑。

高等教育理论，内含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和探讨，是牢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系统、完善、科学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但对于指导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仍需继续加强。要明确高等教育理论为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建设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服务的研究任务和时代使命，以学科为中心，聚集研究力量，规范研究行为，建立健全服

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真正实现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智力支撑。只有保持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才能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深刻实践，才能在实践和思辨中以理论自信为基础丰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内涵，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

2. 制度强基：以制度自信为保障彰显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优势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制度自信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有力保障。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是党带领全体人民走出来的一条能够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正确道路，需要合理的建制来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高等教育制度，包括服务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各种建制，是保障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基本规则和体制机制，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规律性和优越性的系统体现。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我国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以科举为选拔标准、以服务封建统治为目的的系统完备的古代高等教育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是在嫁接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高等教育制度基础，为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胡适、郭秉文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介绍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并先后效仿德国和美国颁行了“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推动了现代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创设以及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形成，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层面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历史性重建，在“全面学苏”的基础上创建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1950年，国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等五项草案，明确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适应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从1977年颁布《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制度，到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随后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五大体制”改革、“211工程”

和“985工程”建设以及现在正进行的“双一流”建设等，包括招生考试制度、管理制度、学位制度、分配制度等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日臻完善，“从高度集中走向‘放管服’结合，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高校自主办学的格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有力保障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前进与发展。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阶段所施行的各种教育制度，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建制的有力保障中得以选择和定型，并充满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是我们党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基础和自信底气，也是我们党通过扬弃和超越西方高等教育建制模式、立足本土实践自主探索所建构的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相适切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在建制和调试中彰显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优势，构筑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新时代新征程，“高等教育作为提升人力资本、推进科技创新、扩张消费市场的重要教育阶段，其规模与质量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要加快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

3. 文化铸魂：以文化自信为内核增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认同

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为内核增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史，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坚定文化自信和坚持党的领导、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光辉历史，彰显出坚定的文化立场和充沛的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文化自信的“根”和“魂”。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有着培养“德才兼备”“君子”的高等育人文化，形成了兴学重教、立德树人的高等教育传统，建立了崇尚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最深厚的文化基因。今天高等教育中的“因材施教”在承继其原本的传统意涵的同时，还增加了公平、科学等现代性内涵。中国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文化自信的“脊”与“梁”。

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必须大力弘扬以“西迁精神”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高校内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再到三线建设时期的高校外迁，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听党指挥跟党走“西迁精神”。“西迁精神”彰显了中国大学和学人奋发图强的自主意识，既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大学精神，更是未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文化自信的“芯”与“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作用，是巩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保障。要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一系列论述，既指明了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也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内核和精神力量。

高等教育文化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对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发扬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中不断丰富起来的，浸润于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发展之中。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是“在‘借鉴 - 超越’思想指导下，通过文化自觉与自主创新，努力构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我国之所以能开拓出有别于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正是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融入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时代内涵，在传承和创新中增强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认同，在文化自信中坚定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

三、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提升路径

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同我国基本国情、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厚植了道

路自信。进一步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在实践中保持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必须坚定历史自信、筑牢理论自信、夯实制度自信、厚植文化自信。

1. 坚定历史自信：明确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定位

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首要命题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客观认识和高度自信。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能否取得新的历史成就，关键在于有无坚定的历史自信。第一，尊重历史规律，在全面总结和评价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探索历史中坚定自信。“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高等教育历史认识基础上的，没有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百年探索历程的科学认识和系统总结，历史自信便难以形成。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与西方高等教育不同的模式，具有鲜明浓厚的中国特色。清末民初，中国高等教育在移植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的同时，积极探索走上了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的早期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国先学习苏联后自主探索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最终走出一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新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孕育、探索与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但方向正确、成效显著，为全党和全体人民继续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和历史智慧，也坚定了历史自信。第二，增强主动精神，在牢牢把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新的历史定位中坚定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赋予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要在深刻认识党领导高等教育现代化百年奋斗经验和伟大成就基础上牢牢掌握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着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高等教育对外开

放战略，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高质发展，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姿态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时代浪潮。总之，要深刻把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规律和历史定位，在坚定历史自信基础上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继续前进。

2. 筑牢理论自信：优化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引领

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必须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筑牢理论自信。冯友兰早在1945年便明确指出，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需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底独立”。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争取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学术独立，是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中外学术界并不存在独立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当前学术界所探讨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以及我国政策话语中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等概念，实际上是把现代化理论耦合于高等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分支理论和经验表达。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程中，高等教育界展开了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相关研究。例如，蔡元培的“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等思想为北大改革及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蒋南翔在高校和行政领导工作中为中国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对“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行了深刻阐释；潘懋元作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拓荒者和深耕者，“可能是最早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世界的学者，堪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中国符号”。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界在学习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的同时，展开了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中国探索。时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建设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阐释并挖掘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重要政策法规、制度文本和教育理论的内涵精义。学者须充分研读和领会我国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文本以及学界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相关研究，揭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形态、结构特征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方式、基本逻辑，明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与内涵体系。第二，立足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土实践。

学者须认真归纳总结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经验，在关照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丰富实践的同时发展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将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经验和规律总结转译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学术话语。第三，客观理性地吸收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在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处理好中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话语之间的互相参照，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和制度优势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进行积极探索和创造性发展，并为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学术独立性的建设，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生存状态与地位”，必须以充分的理论自觉基于学科立场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要义、本质特征、逻辑构架、发展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话语”进行解答和阐释，为坚定不移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思想遵循，筑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信。

3. 夯实制度自信：巩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必须以制度自信为基础，持续推进符合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制度建设。面对剧烈变化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语境，中国高等教育正经历着制度性的深刻变革和教育形态的创新发展，这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保障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着力完善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制度体系。“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与结构体系重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陕北公学探索的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到如今在高等学校施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体制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是坚持党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全面领导的根本制度和关键环节，必须做好高等教育领域党的全面领导体制机制建设的整体设计和贯彻落实，紧抓高等教育系统党的建设，维护好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思想的统一和意识形态安全。第二，着力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并制定了一系列涉及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政策，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要认真总结党和国家在高

等教育制度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有益经验，建立健全符合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相兼容的、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的特色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第三，着力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要“规范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建立明确清晰的工作职责及权责清楚的推进机制”，“建立导向鲜明的评价机制和多者联动的协调机制”以及“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的深刻变革，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优化高等教育治理效力，保障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总之，进一步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巩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是以制度自信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基本要求。

4. 厚植文化自信：增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自信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文化自信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文化自信，在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等多重维度彰显出巨大价值。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厚植文化自信。第一，着力破解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的文化难题。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能走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充分考虑并正确处理了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破解当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的文化难题，必须有效释放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在的文化张力，处理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身内部之间的关系，发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生性文化力量。第二，增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的文化自信。高等教育主体是推动我国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中坚力量，其文化自信是继承与创新高等教育多元文化和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与关键。只有在充分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清醒地认识和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浪潮中确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世界标识。中国式高等教

育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之一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关键在于塑育高等教育主体的文化自信并发挥高等教育主体的文化选择力，这是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客观选择。第三，厚植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的文化自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本民族文化基因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现代化呈现，其核心是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自信。厚植文化自信能够使我国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获得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文化自信的形塑与培植要求理解并认同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正确看待和处理世界多元文化的本质与联系，对不同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选择持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高度认同并充满信心。此外，教育者要通过教育教学正确地引导受教育者客观看待不同民族多元文化并认同本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树立受教育者的文化自信，培育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破解文化难题、增强文化自信、厚植文化自信，激发和振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坚强自信，才能促使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经过百余年的实践探索开辟出的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深厚的道路自信底蕴。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也日益凸显。毋庸置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增强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全面领导，以更加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信心百倍地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为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付卫东

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下的“强师之路”：何以为忧与何以化忧

来源 | 《中国教育学刊》2024 年 01 期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付卫东

教育数字化转型赋予了高质量教师发展的新思想、新方向与新路径。从教师发展的视角审视教育数字化转型下“强师之路”的现实隐忧，包括能力之困、发展局限、公平隐忧与治理偏差等方面。据此，提出相应的消解路径：夯实教育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优化教育新基建“自主”建设；赋能教师数字能力转型，打造互利共生的师生关系；促进教师培训资源开放共享，深耕分层分类的精准化培训改革；寻求积极差异与弥补数字鸿沟，探索协同联动教师发展模式；推动数据循证的教师队伍治理，优化治理偏差的调节机制。

《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教育信息化的特殊阶段，是以数字技术赋能为主线，对教育各环节、各要素进行全方位变革的过程，旨在构建基础教育新生态，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加快落实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也是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2022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以下简称“强师计划”）强调要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中去，为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由此可见，“强师”嵌于“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为落实“强师计划”，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与创新型教师队伍，需要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升级、数字化资源供给、教师数字素养培养、数字治理体系构建等战略发挥助力作用。

当前已有研究探索了教师队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具体路径等方面，但仍缺乏系统性梳理，对“强师之路”的隐忧问题认识还不够清晰。整体来看，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和实践处于起步阶段，在此背景下探讨教师发展的困境也不太充分。而且，考虑到教师在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如何重构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教师培养与发展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厘清教育数字化转型下“强师”内涵的基础上，探讨高水平教师发展的现实隐忧和解决路径。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下的“强师”内涵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于教师，“强师计划”目的在于促进教师数量、素质、结构的协调发展。如何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强师”成为重要议题。本研究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强师”的多维内涵。

一是教师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强师计划”提出要建立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平台，完善多主体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数字化转型强调要为教师教育改革提供智能多元的环境基础与资源保障，如智慧学习空间、虚实教学场景等增强教师教育环境的智能化；学习分析技术与智能导师系统实现学习特征的智能诊断与个性化资源推荐，大数据技术支持职前职后一体化学习资源库建设。此外，数字化转型促进教师教育模式与评价方式的创新性。如智能学习伙伴、教育决策助手等机器教师与人类教师分工协作与共享教学智慧，促进教师教育师资多元化；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精准测评加快推动职前与职后培养的一体化。

二是教师能力结构的多元化。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求教师具备数字化教学能力、德育胜任力、自我发展能力等多元能力。数字化教学能力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其涵盖了数字化教学意识、数据思维与数据决策能力、数字化教学内容表现力、人机协同能力等方面。德育胜任力在数字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教师的德育思维转变为利用学生品德发展的数据进行德育决策；德育工作重点转向基于德育数据提供个性化德育服务；德育专业能力转向关注学生数字化生存特征与开展跨学科德育课程。自我发展能力则需教师学习和更新知识体系，培养自主学习、协同学习、终身学习等能力。

三是教师资源配置的公平化。强师之“强”的关键在于优质公平。“强师计划”强调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为重点，推动中小学师资优质均衡。教师资源配置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突破口，而教育数字化转型下的教师资源配置也呈现出新的样态。首先，构建教师资源数据库能够实现资源的统筹规划与精细化管理，保障不同区域教师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的动态平衡。其次，数字化手段能够精准识别帮扶对象的特征，科学调整教育资源投放，实现教育帮扶由粗放走向精准、由群体化走向个体化。此外，数据驱动的督查跟踪模式能够动态监测教师资源的配置，提高配置效率。

四是教师治理机制的创新性。治理是教师发展的重要指挥棒。“强师计划”强调要构建现代教师队伍治理体系。基于教师发展特点与规律，探索编制管理、工资待遇、评价考核、绩效奖励、职称评聘、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创新治理机制，具体包括：精准把握教师规模增加与编制数量限制之间的平衡，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教师编制动态调整；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性考核与个性化评价，借助大数据分析画像技术掌握教师发展动态；依托数字平台拓展教师专业发展空间，为教师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资源和发展渠道。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下“强师之路”的现实隐忧

“强师计划”体现了高质量发展赋予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时代性与紧迫性，

教育数字化转型也赋予了“强师”之路的整体性与个体性。厘清教育数字化转型下“强师”建设的隐忧问题，促进教师队伍由“多”到“强”，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至关重要。“强师之路”的现实隐忧表现为能力之困、发展局限、公平隐忧与治理偏差。

1. 能力之困：数字素养欠缺与师生情感虚化导致教学能力提升新瓶颈

教育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构教学要素，对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出新要求。但目前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与教育数字化转型所期望的“系统性变革”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数据思维意识不足。数据驱动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数据赋能”的思维是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多数教师面对海量教育数据具有无力感，对数据工具的理解与掌握程度有限，这可能导致数据技术的应用动力不足、应用层次不高的问题。

二是数字化教学能力较为欠缺。在技术使用态度方面，教师技术焦虑情绪较为严重。而且技术焦虑也表现出多种样态，如认知困境焦虑、岗位替代焦虑、技术障碍焦虑等。在技术应用方面，部分教师尚未发挥交互资源、全息资源等“新数字资源”赋能教学的作用，尚未挖掘其与传统资源的粘连效应；数字技术的应用尚未实现灌输式与控制式教学方式的颠覆性重塑与学习流程的全面性改变，难以摆脱“效果不显著”的窘境。

三是盲目使用数字技术导致师生情感虚化。虽然技术承担了部分重复性工作，但忽视了人机交互的温度。具体而言，当师生间的交流更多依赖于网络 and 平台时，情感交流也会变得虚化和缺乏真实感。而且随着虚拟化身的介入，师生关系由单纯的实体关系，演变成真人教师、虚拟教师与真人学生、虚拟学生间的多主体关系样态，这可能使教师迷失教学目标的真实指向性，甚至忽略育人本质，使教育变得功利和机械。

2. 发展局限：培训供给失衡与评价桎梏引发教师专业发展新难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撬动教师培训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值得关注，主要体现在教师培训供给结构性失衡、培训评价桎梏两个方面。前者突出表现为；一是

培训资源供给的不充分、不均衡、不精准、不灵活。如何实现线上资源的动态调整与优胜劣汰、线上与线下资源的精准匹配与结构化配置、满足教师多元化需求是教师培训供给面临的新问题。二是培训模式面临革新的挑战。技术发展催生了线上线下融合的培训方式，但目前培训内容存在“一刀切”的现象，较少关注教师个性化需求；在线教师培训披上了技术的“外衣”，陷入“重形式、轻效果”的误区。

教师培训质量高度依赖有效的管理与评估模式。但目前教师培训评价方面的难点一直未得到有效破解，如培训项目管理的疏漏导致不同培训内容存在交叉，部分培训内容存在“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培训效果评价流于形式，常态化评价机制尚未形成。同时，数字化转型也引发了一些新难题，如如何有效管理与监测线上线下混合式培训、如何设置系统动态的评价标准等。

3. 公平隐忧：资源配置不均与内部动机差异催生教师数字化发展新鸿沟

数字技术在促进教育变革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社会不公。教育资源在区域、城乡、学校间的配置不均，可能引发数字技术使用动机、技能方面的新数字鸿沟，进而折射到教师数字能力上。城乡教师数字化发展鸿沟尤为凸显，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叠加会使其进一步加大。此外，区域层面的数字鸿沟也一直存在，部分先行试点区与落后地区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如上海是实施“电子书包”“数字教材”项目的先行试点区，引领了其他地区数字教育的发展；而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源限制、信息闭塞，在数字化发展方面“道阻且长”。

另一方面，教师技术使用的内部动机差异也是导致新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需求匮乏与技术焦虑两个方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低层次需求满足后才会产生高层次需求。相对于城市教师而言，乡村教师较重的经济压力使其无暇关注自身专业发展，再加上乡村学校数字化建设相对薄弱，使乡村教师仅关注日常教学的平稳运行，忽视了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高需求。此外，随着新兴技术的出现，不少教师出现了技术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会驱使教师产生根深蒂固的教学思维定式，对待新技术与新理念“无动于衷”，久而久之，就会使其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很难在教学过程中创造性、批判性地使用技术。

4. 治理偏差：信息孤岛与伦理风险滋生教师队伍现代化治理新问题

由于缺乏完善的信息共建共享机制，教师管理系统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即教师培养、培训等数据尚未实现共享和融通。在教师职前培养阶段，专业学科设置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不高，导致有些学科教师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在教师职后培训阶段，培训供给主体缺乏对培训对象的需求分析，导致培训内容与实际脱节、培训内容重复、培训效果较低。同时，不同区域教师、同一学校不同学科教师参与培训的机会存在较大差异，如城乡教师参与培训的比例严重失衡，语文、数学等常规学科教师的机会更多，新进教师或能力强的教师参与的可能性更大等。

数字技术的介入虽然更新了教师队伍治理的主体、内容及路径，但也滋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教师隐私泄露问题，视频监控、智能设备等在记录数据时可能泄露教师的生理、心理、行为等信息，网络算法等技术可以捕捉与推测教师的行为偏好等隐性行为，这将赤裸裸地展现教师外在显性行为与内在心理世界，可能带来麻烦。而且，教师隐私泄露往往具有较强的传播性，并且很难探测与溯源，所带来的风险也是不可预估的。二是算法困境引发的风险。智能算法在精准预测教师数量、结构变化趋势时，用冰冷的数据符号来识别、匹配、监测与评估，可能会弱化教师个体的自我意识感知。而且数据分析可能存在偏差，使教师发展由于数据分析的限制被窄化为单一路径，导致教师自我发展认知的“信息茧房”效应。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下“强师之路”隐忧的消解路径

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教师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基于上述提到的现实隐忧，从基础设施的筑基与升级、教育理念的转变与回归、能力结构的转型与提质、专业发展的精准与实践、教师资源的补短与扶弱、角色关系的交互与共生、治理模式的数治与善治回答了“如何消解现实隐忧”的问题。

1. “夯实与筑基”：夯实教育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优化教育新基建“自主”建设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教师发展是一项系统、开放、长期性工程，该过程需要

内外部环境空间资源与信息的交换与互动，外部环境中的宏观政策环境与教育新基建建设是教师发展数字化转型的两大保障。顶层制度设计与战略规划是首要关键点。首先，政府应完善数字化技术配套政策。如教育数字化标准、师生数字素养发展规划、教育数据监管规范、数字技术质量保障制度等。其次，政府还应发挥统筹作用，将教育数字化转型理念贯穿于教育及相关领域，保证教育决策的一致性与科学性；加强相关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并鼓励社会各主体积极参与决策。最后，政府要提高组织领导力与技术领导力，既要注重提升组织成员的执行能力、协调管理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又要加强培养组织成员的技术应用能力、数据分析与决策能力。

教育新基建是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物质基础，也是促进教师数字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产品的应用多为“拿来主义”，缺乏自主性与本土化。为夯实教师发展的数字化底座，就需推动技术产品的自主研发。在网络建设方面，搭建融入5G等新兴技术的自主可控的泛互联网架构，创造基于云的物联网服务环境，满足教育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的新要求与高标准。在资源建设方面，完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对数字资源进行细粒度划分，实现各级平台的互联互通与开放协同。在智慧校园建设方面，鼓励学校与企业共同研发本土化教学资源，让师生自主选择、编辑与使用工具，提升技术使用的获得感。在创新应用方面，增强对软硬件应用的合理规划，加快研制数字应用与评价标准，完善开放动态的应用接口体系，提供通用性的基础应用服务，促进教育新基建的创新应用。在可信安全方面，完善标准一致的数字技术与产品安全使用体系，提升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管理者、师生的数据安全意识与技术道德规范。

2. “转型与共生”：赋能教师数字能力转型，打造互利共生的师生关系

教育数字化转型注重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构建高层次的师生情感交互关系。

第一，促进教师数字能力提质增效。首先，培养教师的数据思维。学校应重塑数据文化，提升教师对教育大数据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以实践为牵引构建教师数据思维发展共同体，推动教师在教研中嵌入数据协作任务，在实践中掌握数据

整合、收集、分析、处理能力。其次，提升教师以“学”为中心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具体包括：利用数据挖掘、学习分析等掌握学生的认知风格，开展个性化教学；融合多学科知识开发课程资源与开展跨学科教学；基于多模态数据分析、视频分析等采集行为、生理与心理等数据，开展全过程、动态性评价。最后，夯实人机协同育人效果。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在于实现人机融合，达到大规模因材施教的目的。具体到教学中，真人教师与机器教师要分工明确、优势互补。机器教师负责完成重复性工作、数据分析等，如通过自然语言、数据挖掘等技术提供个性化教案；通过人脸识别、人体姿态评估、语音识别等技术记录学习过程；通过智能平台进行学情分析、个性化答疑与全息检测评价等。真人教师则弥补机器不能做到的事情，包括探索更灵活化的人机协作教学模式，以及对数字空间情感线索的关注和学生情绪的理解。

第二，打造互利共生的师生关系。数字技术对人类情感生发与表达机制的仿刻尚不成熟，对教学交互中人的复杂而微妙的情感信息捕捉有限，情绪感知与反馈存在一定偏差，可能引发数字环境中师生主体发展的异化。为此，教师应防止技术滥用导致的师生情感关系虚化，要理性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时间福利”，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创设更有温度的深层情感交互模式。首先，应充分挖掘数字技术在互利共生关系中的中轴作用，既要创设富有情感温度的智能对话情境，运用情感计算、深度学习等感知、识别与理解学生的情感信息和学习需求，也要利用智能媒介的问候功能拉近互动距离，减少学生的孤独感与无助感。其次，强化教师在智能交互场域中的情感价值引领作用，一方面教师应借助数字技术掌握学生的情绪变化，同时也要加强对学生情感、态度的引导，通过面对面的语言、手势、表情等传递情感关注，打造有温度的数字教育。此外，教师还应提高数字技术使用的伦理规范意识，强化对学生数据信息的管理与保护意识，并提升妥善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3. “共享与精准”：促进教师培训资源开放共享，深耕分层分类的精准化培训改革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阶段，促进教师培训创新是促进教师数字化发展的有效抓

手。针对教师培训资源质量不高、数字化资源动态性差、内容与需求脱节的短板，应加强数字化教师培训课程建设，促进培训资源开放共享。其一，建设区域教师培训课程资源库。地方教育部门、教师培训机构和中小学应联合建设该资源库，立足教师发展需求筛选优质微课、慕课等资源，并建立资源动态调整机制，提高资源库的实用性和适应性。其二，建立教师培训资源智能推荐机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制定资源开发与准入标准，利用大数据分析与智能画像技术提取与整合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为教师定制数字课程资源。其三，健全培训资源评价与监管机制。组建由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人员、教育专家等多主体参与的教师培训资源审查小组，对资源进行开发、测试、评估与修改，并通过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实时记录与分析教师使用的习惯与行为，及时发现、诊断与解决问题。

在培训方式方面探索分层分类的精准化培训体系，加快教师数字化转型发展。首先，创设“场景嵌入式、服务伴随式、学习泛在式”的智能研修环境，构建精准化智能研修模式。基于教师研修数据捕捉不同区域、不同学段、不同教学能力的教师需求，差异化组织教师研修。其次，构建分层次、分类型、分阶段的教师专业发展测评系统。立足于教师能力水平设置评价梯度标准，并区分不同教师的专业领域和特殊需求，同时根据教师发展阶段设定测评周期和开展动态测评，提高测评的精准性。同时，应构建数据驱动的培训共同体，聘请数据专家与教师共同成立数据团队，定期培训教师分析数据、理解数据信息的能力，并以远程参与和线下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渗透式指导与体验式教学，从而帮助教师作出精准的教学决策。最后，建立大数据分析支持的评价模式。将数据分析技术贯穿于培训前的问题诊断、培训中的活动设计与评估、培训后的效果检验与反思改进，强化基于科学证据的教师培训实践探索。此外，学校还可搭建校本化的教学实践证据库，将教学、培训相关实践证据等纳入其中，帮助教师实时检索、运用与推广优秀实践经验，生成教学实践智慧。

4. “弥合与发展”：寻求积极差异与弥补数字鸿沟，探索协同联动教师发展模式

解决区域、城乡间的数字化发展鸿沟，关键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即从简单

均等转变为寻求积极差异。积极差异的内涵是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意义上体现规模、功能、地理特征，并为薄弱学校增加教育资源投入，使其与其他学校大体相当。具体到教师数字化发展鸿沟问题上，一方面，应完善优质均衡发展的数字化保障机制。既要从宏观层面加强政策指引，提升协同发展意识，又要从微观层面落实“三个课堂”（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等教育实践，提升教育帮扶效果。同时，确保教育整体投入与精准帮扶相辅相成，缩小教育新基建的区域差距，如加强薄弱地区及乡村学校的新型教育网络建设，搭建5G微基站，升级配置智能化教学设备，并提供资费补贴。另一方面，激发薄弱学校教师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内生性”。构建“对话式”教师教育推动教师教育者、教师、数字技术研发者、学生主体间的相互接纳，在协同互动中缓解技术焦虑情绪；结合培训研修、绩效激励等方式，提高教师对数字技术价值的认识，追求自身能力的“上限”。

此外，协同联动的教师发展模式是促进教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应构建教师协同发展共同体，形成“以长补短”“以强扶弱”的教师发展集群，优化教师数字化教学的理念与策略。具体而言，持续落实三个课堂实践效果，缓解乡村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创建网络交互平台实现数字资源互通共享，允许教师自由上传或获取教育资源；搭建在线教师网络教研平台，为教师提供自由协作、实时探讨的教研氛围；建立教师数字化发展动态数据库，通过充分调研与实际摸排，结合问卷数据和案例分析，掌握教师数字化发展情况，便于各级教育部门与学校作出相应决策。

5. “数治与善治”：推动数据循证的教师队伍治理，优化治理偏差的调节机制

推动教师队伍治理转型的关键在于“数治”与“善治”并驾齐驱。“数治”强调对教师数据信息的融合分析与应用。其一，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教师资源配置机制。借助数字技术及算法模型分析整合不同区域、城乡或学校间的教师数据信息，精准掌握教师在不同专业、学历层次、性别、职称等方面的分布情况，预测各地区、各学校对教师总量与学科结构等的供需趋势，从而科学核算与动态调整教师资源。

其二，完善教师队伍管理的监测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优化教师电子档案建设，伴随式收集教师的学习经历、教学经历、培训研修情况等信息，从而精准呈现教师成长数字画像。其三，提高教师评价的动态性与精准性。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在于能够全程记录教师教学与工作中的数据信息，数据挖掘技术能够优化教师评价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实现智能化的跟踪与反馈。

“善治”更加强调教师队伍治理偏差的调节。因此首先要加强数据安全治理。一方面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教育数据安全，明确规定数据采集与使用标准、数据开放与应用权限、个人信息的伦理要求等，防止教师信息的泄漏与隐私的侵犯。另一方面，要注重教育数据使用主体与管理主体的价值引导，提升其数据权责意识、信息安全意识与技术伦理认知。同时，完善教师治理偏差诊断机制。提高教师治理者与决策者基于数据证据诊断问题与提出决策的能力，并拓宽教师治理相关利益者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促进多主体协同分析问题根源与提出解决对策。此外，创建区域教师治理服务平台。允许教师治理者、教育专家、教师等主体自由发表反馈意见，为教师治理部门调整教师发展计划、改进教师培训项目、优化教师考评机制等提供信息支持。



我院院长周洪宇教授著作获第九届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月6日，教育部公示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名单，我院院长周洪宇教授与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大伟博士合著的《陶行知年谱长编》获三等奖（人文社会科学）！

申报成果名称 (系出版、发表时的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教师课改阻抗及消解策略研究	著作	教育学	邵光华	三等奖
大学教师评价的效能	著作	教育学	沈红	三等奖
信息化学习设计：聚焦五大维度	著作	教育学	沈书生	三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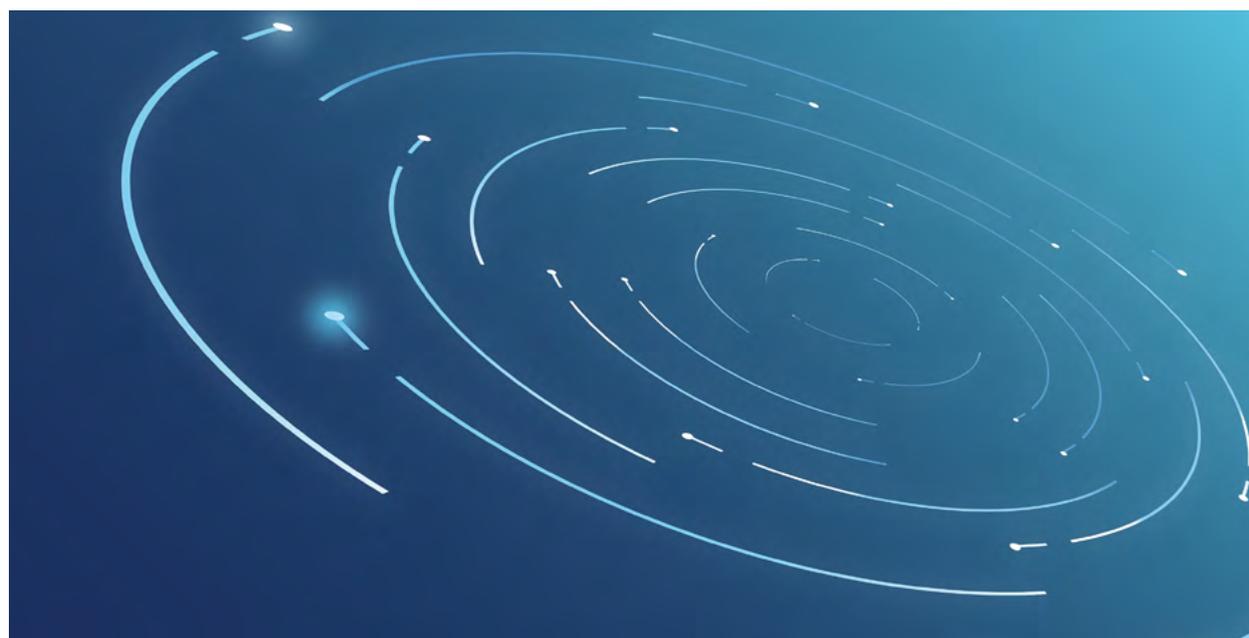
个体、文化、教育与国家认同——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和文化融合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孙杰远	三等奖
教育学核心概念的嬗变与重构——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思考	论文	教育学	谭维智	三等奖
情境教育促进儿童创造力发展：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著作	教育学	王灿明	三等奖
中国研究生教育 70 年	著作	教育学	王战军	三等奖
中国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宣勇	三等奖
道德凸显和伦理隐退的中国德育危机与出路	论文	教育学	严从根	三等奖
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反思	著作	教育学	杨德广	三等奖
中国教育方针论稿	著作	教育学	杨天平	三等奖
教育信息化 2.0：新时代信息技术变革教育的关键历史跃迁	论文	教育学	杨宗凯	三等奖
泛在学习的资源组织模型及其关键技术研究——学习元的理念、技术和应用	著作	教育学	余胜泉	三等奖
双优先：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模式	论文	教育学	袁振国	三等奖
建设价值驱动型学校	著作	教育学	张东娇	三等奖
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政策实施跟踪与评估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周海涛	三等奖
陶行知年谱长编	著作	教育学	周洪宇	三等奖
民国社会教育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周慧梅	三等奖
教育信息化 2.0：智能教育启程，智慧教育领航	论文	教育学	祝智庭	三等奖

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拟奖励成果（三等奖）

《陶行知年谱长编》全四卷，共 180 余万字，以编年体形式重现了陶行知五十五年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全面记录了其生平、事业、著述和思想轨迹，重点呈现了其从事中国教育改造事业的背景、先进事迹和献身精神，并附录了陶行知去世之后有关他的学术活动大事。其成书发端于章开沅先生的建议，饱含周洪宇教授二三十年的勤奋积累及其门下弟子长达十年的接续努力，为广大教育工

作者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实践陶行知丰富多彩的文教活动和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照和智慧借鉴。

据悉，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项自 1995 年开始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本次公示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启动，本次评奖参评成果范围是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成果。据公示名单显示，此次共评选产生拟奖励成果 1491 项，奖项分为著作论文奖（1195 项）、咨询服务报告奖（76 项）、普及读物奖（20 项）和青年成果奖（200 项）。其中，普及读物奖和青年成果奖不分等级，其他奖项分设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



长江教育研究院召开 2023 年年会

1月23日，长江教育研究院在湖北省出版文化城召开2023年年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国斌，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彭南生，湖北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副总督学、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文森，以及长江教育研究院2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方平主持。



会上，周洪宇提出，长江教育研究院要以国内外一流教育智库为标杆，从调整研究方向、创新研究方法与技术应用、优化知识传播策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及优化资源利用五个方面着手，充分发挥体制、专家、渠道、出版及教育服务等优势，稳健地跑好“接力赛”，协同地跑好“团体赛”，谱写出更多属于“长江教育研究院新时代华章”。



黄国斌强调，作为教育领域的智库先锋，长江教育研究院成功举办高端学术活动、发布多份教育研究权威报告、出版一系列教育学术图书，尤其是周洪宇院长主编的《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丛书》荣获第五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他表示，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长江教育研究院的发展。



彭南生对长江教育研究院在教育政策与治理、教育决策与咨询、教育智库研究与评价等领域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表示，华中师范大学将继续依托“教育学”

一流学科优势，全力支持长江教育研究院，希望长江教育研究院能够充分发挥智库优势，牢牢把握建设教育强国的前进方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教育智慧和力量。



王文森代表省教育厅对长江教育研究院为扩大湖北教育在全国的影响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周静厅长十分重视教育智库建设和作用发挥，去年已谋划建立了“1+6”的省教育厅智库体系。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将加强与长江教育研究院的合作，并支持长江教育研究院承担省级教育规划课题重大招标项目，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推进我省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李蓬作了2023年工作报告。现场和线上参会的专家们还针对《2024年度中国教育政策建议书》《2024十大教育热点前瞻》等成果研制和启动《中国教育黄皮书（2024年版）》《全球教育竞争力研究丛书》等编写以及2024年全年论坛等进行了商讨。

2023年，长江教育研究院圆满地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在“汇聚智慧、强化品牌”两个方面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举办了4场高端论坛，为建设教育强国献计献策，其中，“2023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已成为全国最高规格最具影响力的论坛之一；发布了权威报告10本，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数据支持和

战略指导，其中，《教育强国建设指数报告》全面评估国家教育强国的建设进程，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版了具有重大价值的教育图书5册，为教育强国的建设注入力量，其中，《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丛书》荣获第五届湖北出版政府奖；成立了省级教育智库联盟，为教育强国的建设注入强大动力，首批加入的8家单位：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与评估院、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以及长江教育研究院将汇聚各省份的教育科研力量，共同推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搭建了多元话交流与传播平台，为教育强国的建设创造积极舆论环境，其中，定期制作发布的12期电子期刊不仅为学术交流和教育实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智库共建单位提供了一个展示研究成果和观点的新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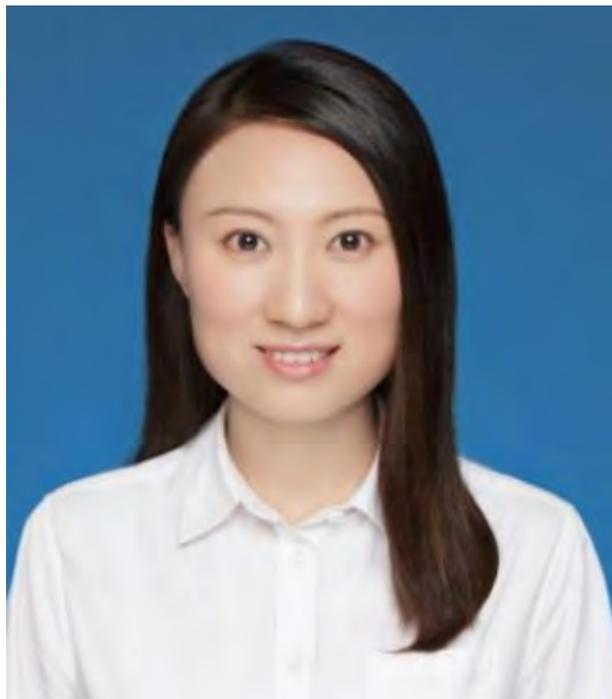


长江教育研究院发布 2024 年度十大教育热点前瞻

《中国教育报》2024 年 02 月 22 日第 3 版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周洪宇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邢欢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强国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教育强国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202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之年。依据这一基本政策导向，我们对今年的十大教育热点作出前瞻性预测。

1. 组织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组织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指面向 2050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保障教育强国建设顺利推进。

教育规划纲要我国针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长期规划和战略纲领，是教育事业建设的有效保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要求，是我国之后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蓝图。2018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我国到2035年迈入教育强国行列作出规划部署。随着教育强国建设的推进，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前部署。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就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教育部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编制，成立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系统谋划设计教育强国建设的施工图和时间表。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把组织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作为工作主线。

组织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稳步推进我国教育强国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2. 提升高等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

提升高等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是指高等教育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等教育作为科技、人才、创新的重要结合点，是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加强高等教育建设，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启动“双一流”建设。2022年1月26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更加突出“双一流”建设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同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强调，高校要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最高追求，坚持战略引领、组织创新、深度融合、系统推进的指导原则。2023年5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

提高高等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将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契合度，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

3. 推进县域基础教育学校建设

推进县域基础教育学校建设，是指以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为重点，通过推动基础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达到规定标准、提升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保障条件、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等，促进县域内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优质均衡发展。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完成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发展，迈向优质均衡发展。《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之一。2021年12月9日，为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和《“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实施幼儿园建设项目、县中标准化建设工程等。202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绝大多数县(市、区、旗)域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目标，强调以“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为重点，加快缩小区域教育差距和县域内城乡教育差距。

推进县域基础学校建设将进一步提高县域基础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水平，提升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推动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优质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4. 巩固深化“双减”成果

巩固深化“双减”成果，是指继续将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作为工作重点，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和课后服务水平、加强校外培训监管等，持续巩固“双减”成效。

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顽疾，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全面部署“双减”工作，提出“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的工作目标。政策实施后，“双减”工作不断深入，相关配套措施陆续推出。2024年1月4日，教育部召开全国“双减”工作视频调度会，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将“双减”工作作为重中之重。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巩固深化“双减”成果。

巩固深化“双减”成果将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和培训负担，促进校内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保障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5. 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

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是指在基础教育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在落实“双减”工作的同时，通过加强中小学校科学教育，发掘社会上的科学教育资源，创造良好的科学教育氛围等，激发中小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提升学生的科学素质。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部分。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2021年6月3日，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将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作为重点。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2023年5月9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推进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将“科学素养提升行动”作为重点任务之一。2023年5月17日，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将“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各项措施全面落地”写入主要目标。2023年10月20日，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部署推进会。

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将有利于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基础。

6. 加强卓越工程师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加强卓越工程师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是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加强工程教育，加强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建设，优化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结构，自主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人才的自主培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21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要求，进一步加强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当前，我国卓越工程师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工作进一步加快。2023年11月24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提出“以基础学科博士生培养为重点推进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以卓越工程师培养为牵引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在这两大重点领域的分类发展改革实现率先突破。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把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主攻方向。

加强卓越工程师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是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关键环节，有助于提升人才资源竞争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开创新局面。

7.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指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过开拓市场化和社会化就业渠道、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构建高质量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加强重点就业群体就业帮扶等，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稳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

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面对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不断增长的高校毕业生规模，我国就业工作仍面临不少挑战。2024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179 万人，同比增加 21 万人。针对这一历史新高，2023 年 12 月 1 日，教育部决定实施“2024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进一步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2023 年 12 月 20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开展 2024 年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的通知》，部署开展 2024 年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其中多场活动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服务对象。

高校毕业生是我国宝贵的人才资源，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一环，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

8.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是指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坚持与产业结合、与地方和政府政策结合、与社会区域结构结合、与个人终身学习结合，坚定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升职业教育对学生和社会的适应性与吸引力。

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教育类型。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挑战，2019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2022 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并部署了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和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战略任务。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将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建设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9. 在教育数字化国际化绿色化方向上开辟发展新空间

在教育的数字化、国际化、绿色化方向上开辟发展新空间，是指以教育数字化、国际化、绿色化为载体，对内推动教育变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对外参与国际教育治理，加快建成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教育中心。

教育的数字化、国际化、绿色化是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发展与转型正深刻改变全球社会，面对这一重大挑战和历史机遇，我国实施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决策，并启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数字教育是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的教育。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在教育的数字化、国际化、绿色化方向上开辟发展新空间。1月30日至31日，由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国拥有丰富的科技与应用场景、海量的教育数据资源和终身学习的强大需求，我们要扩大优质资源共享，推动教育变革创新，将中国数字教育打造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平台，为世界数字教育发展和变革提供有效选择。

在教育的数字化、国际化、绿色化方向上开辟发展新空间，是我国教育事业应对世界变化、引领发展趋势的战略举措，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教育的智慧和力量。

10. 培育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

培育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是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重要指示，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师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201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的目标任务。2022年4月2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明确指出，要“培养造就一批

引领教育改革发展、辐射带动区域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的教育家”。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强化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以教师之强支撑教育之强。

培育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有利于全方位地提升我国教师队伍水平，造就人民教育家，为建设教育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202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优质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17多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奉献力量。自2016年来，连续三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排名稳扎前三。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jy2006@cjy.com.cn

官网地址：<http://cjy.com.cn/>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277号湖北教育出版社5楼